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近代史学思想前卷

陈鹏鸣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近代史学思想前卷

陈鹏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近代史学思想前卷/陈鹏鸣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 9

ISBN 978-7-211-07828-8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②史学
思想—中国—近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5350 号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近代史学思想前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JINDAI SHIXUE SIXIANG QIANJUAN

作 者：陈鹏鸣

责任编辑：郑翠云 林丽萍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 政 编 码：350001

印 刷：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2.75

字 数：34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828-8

定 价：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去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年10月

題記

吳懷祺

要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学，要体会道咸以降的史学思潮发展大势，就应当对有清一代的史学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应当联系本书的清代卷进行分析。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有清一代的学术做了一次清理，总结有清一代包括史学在内的各门学术的成绩，分门别类，开列出清单，洋洋洒洒，很是光彩，清代史学成就确实耀眼得很。但是到了乾隆后期，走上了另一阶段。所谓乾嘉史学，不只是提法笼统不很恰切，而且无法和两汉、两宋的史学相比，也无法和清初史学比肩。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以纪传体史书为代表的古典传统史学，提出了结论性的看法。在此，有必要再一次引用章氏在《书教下》中的一段话，他说：

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

——章学诚宣告了以纪传体史书为代表的古典史学的终结，关键是史学少了最初的创造力，没有“别识心裁”。当然，中国传统的古典史学实际的终结，是在晚清，是20世纪的事。纪传体史书“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成了一具没有见识、缺少内容、只重形式的“架构”“空壳”。

——提出变革传统史学的思路。在史学上，应当思变通之道。变革传统史学的任务提出来了，应当有新的史学产生。至于如何“变易”，他没有更多的新思路，还是以“复古学”为旗帜，用时下流行的话，就是恢复经学的原典精神，恢复“六经皆史”的经世史学传统；在编纂学上，要恢复“圆而神”“方以智”的要求；等等。

——构想史书编写的体系。把家谱、方志与朝史联成一个体系。他的方志学与史学是一个整体。

——提出自己的历史理论。他用“三人同居一室”说，解释社会机构产生的道理。但在这方面，他没有超出前人如柳宗元的思想。

总之，他提出更新史学的任务，也做出了努力，却无法完成这个任务。^[1]当时富有生气的边疆史地学，也没有能够为史学的开拓，带来深远的效应。

章学诚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他的学术活动在乾隆后半期。那时考据学的大家如王鸣盛（1722—1797年）、赵翼（1727—1804年）、钱大昕（1728—1804年）等颇为勤勉，考史又论史，做了不少事，但在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上没有重大建树，也没有大历史作品。与章学诚生活年代大致相当的时期，在西方，历史哲学却有重大进展，出现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人物，如：康德（1724—1804年）、吉本（1737—1794年）、赫尔德（1744—1803年）、孔多塞（1743—1794

[1]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与在史学上的贡献，拙作《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第十章，有较为详细的论说。

年)等，也有大历史作品产生。从世界大范围看，当时在中国史学思想领域内，是章学诚撑起了半个天。他是我国18世纪的伟大学人之一。

章学诚一生困苦，《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生前无法刊刻，是他的长子章华绂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付梓行世，这已是辞世后30年的事了。章氏的呐喊是空谷回音，相当孤寂，他说：“朋辈征蕴，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意气寂寞”^[1]。而与章氏同时代的英国人吉本，是另一样的学术命运。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于1776年出版，立即轰动了英国学术界，很快被抢购一空，在短期内再版了三次。^[2]

到了19世纪，西方史学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称19世纪在西方是“历史学的世纪”^[3]。

在历史思想上，是：历史思想，推陈出新，如其时弥漫的历史主义思潮可谓是人类历史思想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又如德国哲人黑格尔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辩证论说，是19世纪西方历史思想又一重大成就；再如日趋完整的历史进化思想，在达尔文学说的影响下，也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等等。

在史学上，是：史学流派，繁衍不绝，先是浪漫主义史学占据史坛，继而是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称雄，与兰克及其学派大体同时的巴克尔等人的实证主义史学风行，此消彼长，各领风骚，但德国的兰克史学百年来几乎一直被奉为近代西方史学的正宗。以上是就史学流派的大势而言，此外还有丛生的各家各派，更不必说当时西方各国史学流派之纷争了。

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跃居为人文科学之首。历史学专业化，高级专门人才不断地被培养出来；在国民教育中，历史课程的设置与教学，被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法国在历史学家杜罗伊担任教育部长时，把历史课列为国民教育的基础课。欧美各国创办了历史学会与杂志。德国《历史杂志》(1859年)，法国有《历史评论》(1876年)，英国有《英

[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2] 见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平装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106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3] 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国历史评论》(1886年)，美国有《美国历史评论》(1895年)。史学发展还影响到文化、文学，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相当盛行。

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历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革命。^[1]

我们引出上面的事实，只是为本卷的读者提供一个背景材料，对比一下，很使人感慨。

中国史学在局部方面有进展，但相比之下，在总体上是落后了。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一方面要面对世界变动，对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的现实做出反应，所以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始终是近代史学的主潮。而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基本是在原有的学术天地里寻找出路。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世界史的历史观念的发展。魏源的《海国图志》是第一部具有世界史观念的历史学著作。它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变动潮流中，总结历史兴衰的变化；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夷夏观”“正统观”以及历史“盛衰论”做了一定程度的更新。也应该看到，在世界历史格局发生变动以后，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运用到处理中外关系上，具有反侵略的性质，但又有其狭隘的地方。

近代后期，中国史学的编年体、纪传体一类史书的编写以及文献考订、校勘等，有一定的成就，但只能看作是古代史学的余绪。太平天国存在时间很短，在史学上有贡献。他们有自己的修史机构，有修史人员。包括《资政新篇》在内的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中，有丰富的思想资料：平等的思想对等级名分的礼制思想，是一次破坏；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是对传统的历史观念的冲击。但转瞬即逝的云彩，不能留下永恒的记忆。我们应当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思想。^[2]

在中西史学比较上，我想要着重提到自然科学进展对人文科学及对历史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应该说明，“近代科学高度发展以后，许多专门领域已非只有一般训

[1] 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史》，第171页。

[2] 参见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第四章第二节《太平天国在史学上的建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练的史学工作者所能涉足，而且学科门类日益增多，一个史学家要想如同前辈那样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势所不能。但是，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成长和发展，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1]。自然科学进展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大事。西方史学家重视自然科学的事，也能给人以启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和章学诚同时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之后第二卷出版之前，用了五年时间听解剖学、化学等课程，并学习博物学，以求扩展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显然，自然科学对吉本的影响之大是很清楚的。”

另一个是对西方 19 世纪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兰克。“多数西方学者认为，19 世纪自然科学对史学的重要影响在于，它使史学家认识到研究起源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科学的胜利是通过追查事物的起源而取得的……第一个认识到科学史重要性的史学家是兰克。1839 年他在《教皇史》中提出过这一观点。1858 年他提出一件著名的备忘录，向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建议写一部德国科学史，由学者们集体写。次年兰克在致巴伐利亚科学院的第二封信——《德意志科学史提纲》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2]

我们近代史学的落后，有社会原因，但与自然科学落后，是有关系的。^[3]

就自然科学进展对近代历史学的影响，这里要多说两句。自然科学对史学的影响，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

- 大大推进对人类历史进程、历史真相的认识；
- 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 经过哲学的升华，为研究历史开启了新的思维途径，形成研究

[1]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1 页。

[2] 上引见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第 374 页。

[3] 梁启超说到有清一代自然科学也“极发达”，间接影响于各门学术之治学方法也很多；但举不出有力的证明，只能归咎于“做中国学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其中有记述价值的，只有算术和历法方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0 页）



历史的新理念。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自然科学上没有重大的突破，没有骄人的成绩，而且对世界科学进展基本上是不了解。学人只能在复兴今文经学中，在重新解读《易》学著作中，演绎新的历史理论，解说世界的大变动。史家们通过世界一些国家衰亡的惨痛史实，后来又通过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把民族复兴热望寄托在著述之中。公羊经学的进化论与达尔文进化论有相通之处，但前者还是经学中的一种理念，而后者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发展基础之上的历史进化理论。

中国学人对西学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从认识西方船坚炮利的西夷之“长技”开始，进而注意到西方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君主立宪制度的价值。到了后来，中国学人对西方认识更进了一层。变法的失败，老是挨打的痛苦经历，使中国人认识到要寻求新的理论。19世纪末，出现了“学问饥荒”的局面，西学传播、西学译介出现高潮。西方的历史进化理论、史学研究方法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有关声光电化知识和西方的史地方面的作品等传进中国，对中国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中国新史学产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学术发展的结果。

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史学终结的标志，当然，这只意味着传统史学改变自己的形态，作为史学的民族因子融入新史学中。^[2]因此，我们说近代前期中国史学，是从古典史学向近代新史学转变的时期。中国学人努力创新史学，以新史学作为救国的武器，史学者，“爱国心之源泉也”。

古典的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转向这一艰难历程，给人们留下相当多的启示。

本卷著者陈鹏鸣在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阶段，师从仓修良教授、吴泽教授，在章学诚研究上，在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上创获颇多。这些年来，他在近代史学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凡此，都为本卷写作

[1] 参见吴怀祺：《西学和中国近代史学》，1987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史学”。

[2] 参见吴怀祺：《历史学百年·总论》第一章《古典史学的终结与新史学》，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打下基础。研究清代经学对认识中国近代史学十分必要，对近代史学思想的走向的把握，显示出作者探索的深度和力度。经史难分，在近代史学思想研究上也是如此。深矣哉，作史之识力也！

鹏鸣在梁启超研究上也有专书，但本卷的梁启超一章，采纳了武军博士论文的相关内容。学术上的友谊、学术上的相互吸收，是非常宝贵的，这是我想到的书外话。

题

记

目 录

题 记 / 1

导 言 / 1

目
录

第一 编

第一章 近代史学思想的源头 / 18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复兴 / 18

第二节 庄存与“随时”变化的史学思想 / 28

附考 庄存与的家学 / 41

第三节 刘逢禄“穷则必变，变则必反其本”的史学思想 / 46

第四节 宋翔凤“不必泥古人之陈迹”的史学思想 / 54

附 常州学派史学思想的特点 / 67

第二章 龚自珍的“尊史”与历史更革论 / 80

第一节 “六经皆史”论 / 80

第二节 历史变易思想 / 86

第三节 通“当世之务”的史学致用论 / 91

第三章 魏源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 101

第一节 今文经学对魏源史学思想的影响 / 101

- 第二节 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 110
第三节 “无穷极不变之法” / 114

第四章 王先谦“综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 / 119

- 第一节 追求富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 120
第二节 “扶世翼教”的治学目的 / 124
第三节 历史文献学思想 / 129

第五章 晚清当代史研究与史学思想 / 134

- 第一节 “阐幽光、维世教”的史学思想 / 136
第二节 边疆史地研究——“沉沉心事北南东” / 140
第三节 世界史地研究——“师夷长技以制夷” / 144
第四节 鸦片战争史研究中反映出来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 152
第五节 太平天国时期的史学思想 / 158

第二编

第六章 王韬“以通今为先”的史学致用思想 / 172

- 第一节 “从古无不变之局”的历史变易思想 / 173
第二节 “以通今为先”的史学致用思想 / 178
第三节 驳杂的历史观 / 183

第七章 郑观应“断无反诸过去”的史学思想 / 188

- 第一节 “奚必强分夷夏” / 189
第二节 “制无分今古，法无论中西” / 194
第三节 “断无反诸过去”的进化史观 / 197
第四节 富国强兵、抵抗外侮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 201

第八章 黄遵宪“杰俊贵识时”的史学思想 / 204

- 第一节 “变其所当变者”的史学思想 / 205

第二节 历史编纂学思想 / 210

第九章 康有为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倡导 / 217

第一节 康有为对晚清学风的影响 / 217

第二节 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 228

第三节 历史变易论 / 232

第四节 疑古思想 / 235

第五节 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观 / 249

第六节 大同理想及其影响 / 254

第十章 谭嗣同的史学思想 / 267

第一节 进化论的历史哲学 / 268

第二节 唯意志论的历史动力论 / 275

第三节 “民史”思想 / 277

第十一章 严复历史进化的史学思想 / 280

第一节 历史变易思想 / 281

第二节 “不暇问其中若西也” / 285

第三节 进化论的历史观 / 290

第四节 学于自然的治学方法 / 299

第十二章 西学输入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 304

第一节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 304

第二节 西学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构建 / 315

本卷主要参考书目 / 340

导言

“古今中西”是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所谓古今，指的是历史学的研究内容从以古代史为主转向以现当代历史为主，与之相伴，人们的历史观也从将古代社会看作黄金时代的复古论转向进化论，这为最终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所谓中西，指的是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从鄙弃西学，到师夷长技，再到但求富强、不问中西，无疑是个进步，而对“夷”长技的不同认识，更是反映出人们思想的逐渐深入。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西学在中国的兴起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新史学取代封建旧史学的过程。

清朝乾嘉时代的史学思想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想。以往的学者多以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摧残了史学的生命，导致乾嘉史学只余下史考和史补之类的东西，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此时的中国史学也正在寻找着自身的突破方向。那些被称为乾嘉考据学者的文章里，蕴涵着许多丰富的史学思想，如赵翼、戴震等人虽以考史见称，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同样也很丰富。尤其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更是封建史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想法，代表了此时史学开始向求新与求变的方向发展。^[1]

[1]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十章《史学求变和文史通义》，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307页。